

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十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資料出版社 出版

編輯凡例

一、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於保存和積累歷史資料，並推動撰寫資料工作的開展。所選的資料大都是撰寫者的親身經歷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由於每個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實可能不盡翔實，觀點可能不盡正確，因此，本選輯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以供歷史研究工作者的參考。

二、本選輯所選的資料，包括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歷史的各个方面，不拘體裁，只要有史料價值，均可選入。

三、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選錄、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錄

大革命前四川国民党的內訌及其与南北政府的关系

- 熊克武 (1)
- 1917 年成都罗刘、戴刘之战 鄧錫侯 田頌堯 (30)
- 四川討賊軍的兴起和失敗 吳克雄 (41)
- 唐繼堯图川和顧品珍倒唐的經過 金漢鼎 (77)
- 「法」期間唐繼堯与孙中山的矛盾及其演变 詹秉忠 (112)
- 滇軍第二次侵黔实录 嚴池華 (118)
- 《刘建藩零陵独立前后》續述 仇 鰲 (128)
- 赵恆惕上台的阴謀和血手 姚大慈 (145)
- 赵恆惕的省宪活动 黃士衡 (157)
- 陝西靖国軍始末 馬凌甫 (174)
- 閻相文的自杀和馮玉祥督陝 刘 驥 (194)
- 张紹曾事迹回忆 張紹程 (206)

廣疑·补充·訂正

- 几点廣疑 鍾秉之 (241)
- 对《刘湘死后川局波瀾紀略》一文的更正 張志和 (242)
- 关于《旧桂系的兴灭》一文的几点意見 罗翼羣 (242)
- 《重庆战时生产局》文中的补充 翁文灝 (245)
- 对《我在川西起义的經過》的訂正 袁桓楚 (245)
- 方先觉是投降日寇的 滕文藻 (246)
- 关于国际間諜雷鳴远和雷震远史实的几点补正
..... 天津宗教界編史委员会 (246)

对《关于蒋介石汪精卫进行降日活动的见闻》的更正

.....陈铭枢 (248)

关于王赓陆小曼 (249)

有关劳建白的更正劳君展 (251)

张敬尧被打死在北平六国饭店的经过郑庭笈 (253)

对《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谋》的两

点订正.....张宣武 (254)

关于《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的订正

.....周一志 (254)

关于林森任“国府主席”的问题陈铭枢 杨玉清 (257)

关于《陈光甫与上海银行》的更正丁裕长 (257)

有关《邓铿之死》的订正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257)

两点更正曹谷冰 (268)

关于《张静江事迹片断》一文的订正周一志 (259)

三段小更正陆自在 (259)

关于国闻通讯社的补正邓汉祥 (260)

文史资料工作简讯 (262)

附注:

对《四川讨贼军的兴起和打败》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

第三十四辑二八〇页、第四十八辑二四六页

对《唐继尧图川和顾品珍倒唐的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

《选辑》第三十四辑二八〇、二八一页、第三十七辑二四九页

对《滇军第二次侵黔实录》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

三十七辑二四五页

对《张绍曾事迹回忆》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

七辑二四七页、第四十八辑二四七页

大革命前四川国民党的内訌及其 与南北政府的关系

熊克武

大革命前四川国民党的内訌及其与南北政府的关系，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一）自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至 1913 年癸丑討袁失敗为第一阶段，是为党内紛爭开始的时期；（二）自 1913 年討袁失敗，至 1918 年国民党取得川省政权为第二阶段，是为党内内訌逐渐激化的时期；（三）自 1918 年党内展开尖銳斗争，至 1920 年熊克武辞川督职为第三阶段，是为党内内訌演变为战争的时期；（四）自 1923 年討伐曹吳，至 1924 年国民党军队退出四川为第四阶段，是为党内重新合作的时期。现分别略述如下。

一 自 1911 年至 1913 年时期

（一）前清同盟会时期的情况

要叙述民初四川国民党的内訌，必先追述前清同盟会时期有关的一些情况，因为这是有前因后果的关系的。

1906 年以后，东京中国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先生先后派川籍党人謝奉琦、熊克武、黃复生等为四川主盟人，回川吸收党员，策划革

命，发动武装起义。

同盟会时代，我們是沒有武力的，要武装起义只有运动清軍反正；这项工作就由原在新軍中工作的同志龙光、黃斌如、陈万刃等負責进行。四川会党的势力很大，散布的地方也广，巡防营和警察中有他們很多的弟兄，这是个必須爭取的社会力量，由帮会中的同志余英、曾省斋、廖云从等負責联络号召。其他如学校則由服务教育界的同志张培爵、黃复生、黃金鰲等負責，机关由服务劝业道的同志謝持負責，进行宣传联系。我和謝奉琦、余英、曾省斋等往来各地，联络同志，配合力量，負組織起义的責任。这种工作的分工本来是很自然的，但由于某一部分同志长期在一起工作，又因保密跟别一部分同志很少接触，就使得某一部分同志間，关系更为亲密些，而和别一部分同志的关系就生疏些，或者互不相識，这样在同志間的情感上无形中先有了亲疏之别。其次，前清說革命是造反，称革命党人为“土匪”，抓到了就要杀头，家属亲友也要連帶坐罪。因此，党人只能在最可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中进行活动；而初期的同盟会組織既不够严密，个人的組織观念又薄弱，很自然地形成了人与人之間的个别联系。这些情况，对于以后党内的分歧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907年江安、泸州、成都、叙府的起义相繼失敗，党人死难和被捕的很不少，由此在同志間引起了不同的看法和意見。有一部分人由于历次起义損伤很大，主张稳健，认为要等待时机，不要輕易冒险；而大多数人則认为革命是难免要流血的，即使失敗，也可以振奋人心，扩大影响，主张还是繼續干下去。不久，謝持和几个朋友离开四川到陕西去了，据说他們在那里办实业，想搞点經濟基础，作为退步，这就是后来所謂“实业团”的由来。同志們对起义的

不同态度,对于以后在政治問題上見解的紛歧,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党内的情形虽然如此,但在当时問題不大。因为大家都是富有爱国热情、为革命而参加党的;同时又有明显的共同奋斗目标,而环境非常艰险,正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时期,所以以后的广安、嘉定諸役,同志們都同样地踊跃参加,慷慨赴义。應該說,辛亥以前,党内是团結的,行动是一致的,因而对革命的进行并没有发生什么消极的影响。

(二) 成渝軍政府合并問題

1911年(辛亥)武昌首义,四川党人紛起响应。同盟会謝持、楊庶堪、张培爵、朱之洪等在重庆成立蜀軍政府,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成都清防軍也发动兵变,設立大汉軍政府,推尹昌衡为都督,罗綸为副都督。当南北酝酿議和,中山先生託人总統位于袁世凱,以求全国統一的时候,謝持等也策动合并成都、重庆两軍政府,統一四川,共和党政客胡景伊(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是旧川軍中的老資格)乘机附和促成,于是达成協議,合并为四川軍政府,推尹昌衡为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这是四川政局的演变。

我参加辛亥3月29日广州起义后,沒有回川,就在上海同居正、宋教仁、陈英士等筹划武昌起义,曾到武昌去过一次,又轉回上海。辛亥革命成功,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先生为大总統。各省党人紛紛組織北伐軍,旅沪川人也同时組織蜀軍,参加北伐,推举我为总司令。旋南北議和成功,中山先生命我率部回川,后改編为川軍第五师,我任师长。

关于南北合并,不少同志是不贊成的,我是其中之一。我回到重庆知道成渝业已合并,有許多同志是不同意的,所以我一到达重庆,成都方面就派朱之洪来重庆向我說明成渝合并的原因和經過情形。我对朱說:“我刚从南京回来,外面的情形我是知道的。南北議和和让位給袁世凱,并非先生的本意,因为临时約法是管不住袁世凱的。于今成渝合并,所凭借的仍然是一紙協議书,将来怕要吃亏,难免有后悔的一天!”朱之洪急忙解释:“文瀾(胡景伊的別号)无他,可以同我們合作的。”可見他們是相信胡景伊的。

四川光复后,胡景伊由北京来到上海,同志們想要他担任北伐蜀軍总司令,他推辞不干,匆匆回川,大家曾怀疑他別有所图。后来事实証明,胡景伊是奉了袁世凱的使命,回省坐待时机,謀夺这天府之国的。1912年7月,英国嗾使藏軍进犯川边乡城等地,袁世凱即令尹昌衡帶兵出征,任命胡景伊(时任軍团长)护理都督,而不让副都督张培爵代理,且以軍民分治的名义,改派张培爵为民政长,并調京覲見。这就是他們阴谋的第一步。1913年2月,四川省議會选举議長,国民党推楊庶堪、共和党推朱士鏞、进步党推胡駿为候选人,选举結果,楊、朱各得同样的多数票,須进行重选。胡景伊即拉攏共和、进步两党合作,并派軍警威胁議會,选出胡駿为議長,朱士鏞为副議長。6月,袁世凱正式发表胡景伊为四川都督。这个时候,国民党已被排挤于政治舞台之外,大权落于胡景伊之手,四川并入了袁世凱的势力范围。

当1912年冬张培爵、謝持去北京路过重庆时,我們都劝阻他們;我还說:“北京、四川都是一样,不会相信我們的。我們都留在四川,只要同心协力,总可以为桑梓做点事情;有第五师在,他們不敢为难我們。”我又提醒他們:“这次調京覲見,我看是胡文瀾搞的

鬼，最好是借故不去，我总觉得不放心啊！”謝持却很庄重地回答：“大總統電調哪有不去之理！”可是張、謝到夔府后，謝忽然給我來個電報，要我出兵打胡景伊。我們當時很奇怪，為什麼沒有出四川大門就變了卦。隨即回個電說討胡師出無名，勸他們還是不去北京的好。他們還是走了。後來知道，謝持去北京是想活動倒胡的，我們不同意討胡，沒有配合他的倒胡計劃，很不高興，從此就恨了我。

謝持、張培爵北京之行的結果如何呢？袁世凱最初委了他們一個閑差事，不好離開，只得在北京住下來。到了第二年，國民黨討袁失敗，袁世凱開始迫害國民黨人，謝持逃往日本，張培爵遷往天津，開了一家織襪廠，以維持生活，袁世凱還是以亂黨的罪名把他槍斃了。後來我問起謝持這件事，他只說：“烈五（張培爵字）丟了都督不做，去北方打襪子謀生，還不能容他，袁世凱這個人真狠！”其他就不肯多談了。

（三）癸丑討袁之役

1913年（民國二年，癸丑）3月，袁世凱暗殺國民黨代理議長宋教仁於上海，4月非法大借外債，6月免江西、安徽、廣東三省國民黨都督職，中山先生號召討袁。7月李烈鈞首先在湖口起義，南京、安徽、廣東、湖南、福建、四川先後宣布獨立，起兵討袁，均告失敗。國民黨稱之為癸丑討袁之役，或第二次革命。

四川因交通不便，得到消息較遲，8月2日我們在重慶開會決定，通電宣告四川獨立，並推我為四川討袁軍總司令，楊庶堪為民政長。但內部又發生了問題。楊庶堪、朱之洪、盧師誦、呂超、石青陽主張西上討胡（川督胡景伊），認為胡是袁世凱的忠實爪牙，討胡

即所以討袁。很显然，他們是想報“成渝合併”失敗之仇的。我和但懋辛則主張東下討袁。我申述理由說：“第五師有九千人，兵強械好，有力量拿下宜昌、沙市，攻進湖北，與江西、安徽、南京會師北伐，這才是討袁；而且討袁成功，胡景伊也不打自倒了。”爭論好久，為了合作討袁，我們退步，作出名義討袁實際討胡的決定。

正在計劃準備中，王琦（同盟會會員，現任成都市人委會參事）由北京來到重慶。他告訴我外面討袁的形勢後說：北京陸軍部同鄉，知道討袁決不能成事，胡景伊一定會借這個機會解決第五師，勸我辭職，由他們設法派人接替師長，以保全第五師實力，留作他日之用。我告訴他：討胡已經決定了，不能改變。北京同鄉愛護五師，給他們打個電報，和緩一下內外夾擊的局勢，是可以考慮的，但必須和同志們商量，並要楊庶堪起草電稿，以免內部發生誤會。這個消息一傳出去，一部分同志要捉拿“北方說客”王琦，並且說“如果師長包庇王某，連師長也軟禁起來”。我聽到這些話，當即召集大家開會，說明事情經過，征求大家意見，討論結果，還是繼續討胡。

對於討胡的作戰計劃也有爭論，楊等提出個書面意見，軍隊部署和各路司令人選都擬定好了，多半是他們的人，要我點頭同意。我看這個計劃是不行的，向他們解說：“人選沒有什麼。不過敵我的力量為四與一之比（胡景伊有第一、二、三、四共四個師），我們不能分散兵力，應該集中力量，直搗成都，先破其老巢，擒賊擒王，速戰速決，才有勝利的把握。”楊等認為孤軍深入，太冒險，不贊成。最後決定，分兵北路、東路和水道三路，一面消滅在瀘州的敵軍戰鬥力最強的第一師；一面攻取成都。終因兵力分散，持久不決，受敵人內外夾攻，致遭失敗。

9月，袁世凱下令滇、黔、陝、甘、鄂五省聯合川軍，會“剿”四

川討袁軍，黔軍已攻至重慶對河，人心惶惶。這時候，陳澤霈、向傳義來到重慶，向我說：外面大勢已去，現在又兵臨城下，前綫的部隊回援不及，不必再打了；同時重慶紳商也向我請求不要據城作戰，以免糜爛市面。我說我不能丟掉部隊不管，陳、向表示願意代我辦理善後，我只好命令師部軍需處會同市商會將全部公款、軍需、軍實交陳、向，並規定發給官兵回家路費。一切安排妥當，我才偕余際唐離省去滬。臨別時，王子騫（現任四川文史館館員）知道我帶的錢不夠，解下金表鍊子相贈，我至今沒有忘記他對我的熱情。

我們這最後一支的討袁孤軍，在六省的強大兵力圍攻下，當然是失敗了。而這次討袁，四川黨人的犧牲真是太大太慘。戰場上死傷的將士不計外，全省各縣被捕被殺的國民黨員約有三百餘人，且多被抄沒家產。袁世凱還認為不夠，除所謂“首逆”熊克武、楊庶堪“早經宣布罪狀”通緝在案外，又開列在逃的軍隊、議會、機關、學校、報社的黨員名單一百零八人，通令全國各省，“嚴行查拿，勿使漏網”。真是一次極其野蛮無恥的血腥鎮壓啊！然而也一方面說明了袁世凱和四川軍閥是如何地仇恨革命黨人，而四川國民黨員又是如何英勇地反抗他們的敵人——北洋軍閥；另一方面，黨內同志間雖然有些意見，但為忠實奉行中山先生的討袁使命，發揚了“同舟共濟”的精神，這些都是難能而可貴的。

二 自 1913 年至 1918 年時期

（一）討袁失敗以後

討袁失敗，我和謝持、楊庶堪等先後逃亡到東京。我謁見中山先生匯報四川討袁的經過，先生慰勉有加。我又報告：“四川還來

了几位同志，請先生約見他們，予以鼓勵”，先生欣然同意了。我回去轉告大家，都很高兴，獨謝持表示：“我不上伟人的衙門！”我劝他：“还没有去怎么知道是伟人衙門呢？先去看看嘛，如果真是伟人衙門，下次不再去好了。”謝沒有再說什麼，我就陪他們會見了先生；不久先生任謝、楊为秘書。

此后，有人告訴我，謝、楊在東京常約四川同志開會，也不通知我參加，又到处攻击我。我想彼此是多年的同志朋友，过去虽然有些芥蒂，总可以当面說开的。但当我屡次找他們解釋时，他們总是避而不談，而打击我仍旧不遺余力。謝、楊攻击我的几个問題，假使不怀成見的話，都是很容易弄清楚的。第一，謝、楊把四川討袁失敗的責任，完全推到我一个人身上。不錯，我是四川討袁軍的总司令，應該負失敗的責任，但計劃是共同商量決定的；而且是採納他們的意見，已如上述。其次，各省討袁軍已先后失敗，在強大敌人四面圍攻的形勢下，我們这支孤軍还打了一个多月，可算是尽了人事的最大努力。这些事实，他們都是知道的。第二，他們宣传我帶來了十余萬元現款，不肯拿出来接濟同志。首先关于第五師薪餉的處理經過上面已經談過了，事实如何，不难向重慶商會和陳澤霽、向傳義調查即可明白。还有胡景伊（川督）是时时想搞掉第五師的，發給五師的軍餉是限制很嚴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而自五師建立到討袁失敗，为时不过一年多一点，在这种困难情形下，維持已感不易，何能节余十多萬元現款？再說，当时討袁用兵之际，自筹軍餉，因現金缺乏，不得已而發行部分軍用票，即使五師还有存余，这种軍用票能帶到外面使用嗎？这些都是極簡單明了的道理。說到我个人，上面也提到，还是王子驀送我一条金表鍊作路費，其他更可想而知了。第三，我对中山先生是以革命領袖崇拜

他，信仰他；对黄兴則是以領導者和朋友看待他，敬重他（我跟黄兴参加过辛亥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起义）。当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时，因种种关系外传有孙派与黄派之說，我曾再三呼吁：“孙、黄二公，只能合，不能分；合起来力量还嫌不够，一分就更无办法了。”又許多人因反对入党打手模，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我却加盟了。黄兴决定去美国，各省同志举行欢送宴会，我也曾出席，还在会上发言：“希望克強先生早日恢复健康，回到东京，协同总理領導我們革命。”想不到，在別人說我是“孙派”的同时，謝、楊却把我打入了“黄派”。还有一件事，也是由小可以見大的。癸丑討袁之役，袁世凱指熊、楊为“首犯”，胡景伊称为“熊、楊之乱”，四川人称为“熊、楊之变”。楊庶堪屢次表示不滿地說：“孙、黄可以成个名詞，熊、楊不能成个名詞，要么只能說是楊、熊。”后来，林虎、龔振鵬邀我同游南洋，我就离开了日本，謝、楊又給我戴上“南洋派”的帽子。其实在南洋的同志並沒有作什么政治活动。

1915年，中山先生策划各省討袁，由于謝、楊的推荐，发表卢师誥为中华革命軍四川总司令，呂超为川南区司令，石青阳为川东区司令，排挤我和我的朋友。从此，在外人看来，四川国民党形成了以熊、但（懋辛）和以謝、楊为首的两个对立的势力（外称“九人团”和“实业团”）。有同志警告我：以上种种都是实业团有計劃的行动，首脑人物就是他們称为有“宰相才”的謝持，目的就是要在四川創立一个独攬大权的局面。我認为一班朋友的道义結合是可以的，但把它当作攻击人和政治斗争的工具是不对的。我对于四川党內的派系，始終采取这样的态度，且以此勉誡自己。

在我以后回川的几年中，同中山先生很少有信使往还，及报告川省和个人的情况，先生自难了解实际的情形。而謝持、楊庶堪长

期随侍先生左右，获得先生的信任，成为党内和政府的重要人物，对于四川问题的处理，自然先生采纳他们二人的意见。关于我个人，謝、楊随时有说话的机会，久而久之，先生亦难免对我有所疑虑和隔阂，这也是情理之常。但最使我感奋的，先生一旦明了事实真相，即毅然改变他对四川问题的作法和对我的态度。所以，无论先生怎样，我决不肯稍违追随先生革命的初衷，因为我相信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这待下面一一分述。不过謝持得到先生的信任和重用，应该仰体先生大公无私的精神，竭尽忠贞，以赞助革命的事业；而謝持却念念不忘四川，一有机会，就利用职权，假公济私，图谋实现其把持四川政权的野心。这对于制造四川党内的纠纷，以至同志间兵戎相见，謝持是不能辞其责的。具体事实也待下面分别列举了。

(二) 护国之役

1915年(民国四年)5月，袁世凯承袭日本提出的亡国的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对帝制的同意；8月北京出现“筹安会”，准备袁世凯袍笏登台做皇帝。10月，中山先生派员分赴上海、山东、广东、陕西、四川、江西等省活动起义，并发表讨袁宣言和檄文。12月25日，云南首先发难，通电各省一致声讨洪宪帝制；并推蔡锷为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鈞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广东；各省纷起响应。1916年6月6日，这个窃国大盗气愤而死，副总统黎元洪代大总统，接受中山先生及护国军之要求，恢复民元约法，复开民二国会，护国之役遂告结束。

当中山先生发出讨袁宣言和檄文后，流亡南洋的党人纷纷回国，李烈鈞、方声涛、余际唐、但懋辛和我从新加坡先后到香港，轉

道云南，策划討袁。在港遇見卢师誥、张煦等十余人，奉中山先生之命由日回川发动起义，因缺乏旅費，滯留不得动身，我就代借路費，同伴往昆明回川。本来国民党人原拟推李烈鈞为护国軍总司令，蔡鍔到后，以蔡与滇軍將領的关系較李为深，就商推他們二人分任第一、二軍总司令。

我奉派为四川招討軍司令，协同第一軍的滇軍第一梯团对北軍和附逆的旧川軍作战半年，至1916年7月始占領成都，平定川局。黎元洪任命蔡鍔为四川督軍兼省长，蔡因病赴日就医逝世后，改任滇軍总司令罗佩金为督軍，黔軍总司令戴戡为省长，兼会办軍务。川軍整編为五个师：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旧川軍）、第二师师长刘存厚（旧川軍）、第三师师长鍾体道（旧川軍）、第四师师长陈泽霈（国民党）、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国民党）兼重慶鎮守使。

在这次討袁战争中，四川同志間虽然也发生了一些小問題，但基本上是共同行动的。各地党人如顏德基、石青阳、董毅公、范毅、楊維等，不分派系，积极地投入了反袁战争，对护国軍的取得胜利，是起了大小不同的作用的。这一方面說明了四川同志認真执行了中山先生的“一切事宜，务求与討袁各派协同进行，以收羣策羣力之效”（致黨員电）的指示；另一方面表现了四川同志一致反抗北政府的态度。

但这不等于說四川党内没有什么問題，主要是客观环境和主观力量都不許可这样乱搞的。第一，当我組織四川招討軍时，为求党内团結，消灭过去的裂痕，特委卢师誥为参謀长，周官和（无派系）为第一支队长，呂超任第二支队长，而但懋辛、余际唐等列于参議的次要地位。又第五师建立时，我派向传义为第十七团团长，呂超为第十八团团长，这样的安排，同志們自然无話可說。不过謝持却

打电报向卢师誥、呂超查問：为什么重要职务都归熊某一人？可見他还是不滿意的。又卢师誥活动第四师师长不成功，也怪我帮忙不力。第二，当年的四川已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就政治而言，由北方的专制統治，轉变为滇、黔人的共治，四川人并没有掌握自己的省政。就党派而言，由帝制派（陈宦）的独霸，轉变为国民党（罗佩金）与进步党（戴戡）的分权，但罗系云南人，后台老板为唐繼尧。就軍事而言，赶走了北洋軍，进来了滇、黔軍，而川軍五个师中，与北洋軍閥有关系的旧川軍占三个师，国民党軍隊仅两个师，力量为三与二之比。在这种形势下，四川国民党人站得住就不錯了，还有什么求？省中同志們都了解这种情况，也就相安无事。但在南北势力、主客軍、新旧川軍杂处并立的环境中，由于权力和利害的冲突，就构成了南北間、主客間、川軍間錯綜复杂的关系和矛盾，交織着縱横联合和相互斗争，自然要影响到四川党内的分化和內訌。从此內內外外就多事了，而老百姓苦矣！

（三）护法之役

自1916年7月結束护国战争，至1917年9月中山先生在广州組織軍政府以前的一年多中，由于北政府內部的矛盾，和旧川軍与滇、黔軍爭霸的冲突，战事迭起，我們夹在中間，处境是艰难的，应付是困难的。

首先是刘存厚（旧川軍第二师长）用武力赶走了罗佩金（川督），北政府任命戴戡为督軍兼省长，四川成为进步党和黔軍独占的局面。繼之，刘存厚又击败戴戡，北政府任命周道刚（旧川軍第一师长）为督軍，省政权又属于旧川軍。而段祺瑞（北政府內閣总理）阴谋直接控制四川，派长江上游总司令吳光新兼四川查办使，带北軍

入川，以查办“刘、罗”、“刘、戴”之爭为名，实行取周而代之。周道刚本来是欢迎吳光新来的，他想利用吳的权力，驅逐滇、黔軍，并压制我，以巩固自己的权位。后得悉吳帶有数旅之众的北軍，知道来意不善，恐慌起来，又不敢公开反对，便借反客軍的名义，把刘存厚和滇、黔軍之战，扩大为川、滇、黔的战争，以拒阻吳的入川。周道刚也曾要我参加，我不客气地说：“第五师还戴着紅边帽（护国軍軍帽），护国軍不能打护国軍。”周自然恨我，声言赶走滇、黔軍后，即消灭第五师；并电北京政府調我为川边鎮守使，派鍾体道（旧川軍第三师长）接充重庆鎮守使，又电川边鎮守使陈遐龄拒不交代，使我两边落空。

吳光新既有所为而来，而川、滇、黔軍的互斗，两败俱伤，正好坐收漁人之利，就帶着大軍进駐重庆，坐待时机。周道刚一計不成，轉而請求吳光新派兵助战，我却主张“先查后办”，与之对抗，用意是在阻吳帮助周，一方面減輕滇、黔軍的軍事压力，另一方面，我担心如果吳卷入战争漩涡，北軍势必源源而来，战争的扩大，地方的糜烂，将不堪設想。但在吳光新看来，我的主张正合他“坐山观虎斗”的私意，就振振有詞地拒絕了周的要求。周道刚又进而向吳光新献策，說熊某始終是北方的后患，應該合力剷除他。而吳另有他的想法，即利用熊、周的矛盾，互相牵制，便于从中摆布，同时也不肯为周打仗，牺牲自己的实力；因此不采纳周的献計，周是着着失败了。总之，在相互利用、各有打算的情势下，我一个人留在重庆，靜以待变。当时的第五师，一部分駐川东沿江一带，另一部分已协助滇、黔軍共同作战，城内只留下少数的卫队。一天，吳光新的副官长馬麟暗示我：“身边沒有兵是不行的，調点队伍回来吧。”传送这个消息，是否出自馬麟的好意或吳光新的授意，不得而知，